自从红军主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赣闽粤三省建立了纵横千里的中央苏区，在当地取得了骄人的政治成果。

但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围剿苏区的念头，他先后组织了五次围剿作战，前四次都被红军击退。

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时候，王明和博古却犯下了左倾的错误，他们拒绝沿用之前的游击战战术，打算将国民党军队拦截在中央苏区之外。

虽然此时红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红军在之后的正面阵地战场上连续受到重创。

中央苏区也由之前的纵横千里缩小到了三百余里。

此时中共中央内部为了延缓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打算派遣一支部队北上作战，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他们还希望这支部队能够在苏区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赢取全国百姓的支持。

中共中央决定将寻淮州带领的红七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寻淮州郑带领部队在东线战场作战，在接到命令之后他们迅速从连城地区返回江西瑞金。

此时的红七军团在连续作战后只剩下了四千多名战士，为了保证他们的战斗力中央又分给了他们两千名新军，这六千名战士便是先遣队的全部兵力了。

在对红七军团进行重组的时候，寻淮州依然担任军团长的职务。

但是中共中央又派来了曾洪易担任随军代表，乐少华担任政治委员，其麾下还有粟裕等猛将。

由于曾洪益和乐少华的加入，让寻淮州对于队伍的掌控能力其实是不如之前，这为队伍之后的多次无谓转移埋下了伏笔。

在出发前红军总部向寻淮州等人下达了具体的作战命令，要求他们在福建浙江等地展开游击斗争，并努力向北发展。

争取在皖南浙西等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还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半月内抵达最终目的地皖南。

在1934年7月6日晚，寻淮州和乐少华带领先遣队离开了瑞金，踏上了北去的征程

起初他们计划攻打福州，但是福州守军在装备上有巨大优势，红军在强攻中损失惨重。

寻淮州见势不妙便停止了攻打福州的计划，转而带领剩余的队伍进入闽东，与当地的游击部队取得联系，并接连攻下了多个县城。

之后先遣队成员便开始在闽东、闽北等地展开游击作战。

此时寻淮州认为部队在福州战役中损失较大，应该在闽东游击根据地进行进一步修整。

但是曾洪易和乐少华却认为，这是寻淮州产生了畏难的情绪。

并要求他尽快离开这里，按照原先的计划开赴浙西。

寻淮州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采纳，先遣队在没有得到充足休息的情况下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在部队去到浙西之后，中央和寻淮州一直存在战略目标上的分歧。

由于当时王明等人依然控制着中央军委，因此红军总部的左倾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

他们要求寻淮州在浙皖边境地区作战，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寻淮州认为依靠现有的实力，在皖赣边区战斗是更合适的选择。

再加上之后一段时间里，中央军委对于先遣队的任务安排也出现了反复，这让这支队伍始终处在转移的过程中。

不过即使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先遣队依然在闽浙皖赣多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在宣传共产党抗日思想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不但增加了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压力，也为红军主力的转移提供了掩护。

1934年11月初，先遣队从闽浙赣苏区转移到了重溪地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

他们也在中革军委的授意下进行了重组，合并成为新的抗日先遣队，继续在皖南等地进行游击战争。

由于寻淮州在之前的战斗中和中革军委存在较大分歧，他也被降格为第十九师师长。

在新先遣队成立之后，他们也从党中央接受了新的作战任务。

当时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先遣队受命为他们提供掩护。

因此在方志敏等人的带领下，队伍开始在皖南地区继续游击作战，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

在12月中旬，第19师和第2师在皖南太平县的汤口会师，他们本计划在谭家桥布置好埋伏，围歼在周边地区活动的国民党军队。

但是由于对敌人的行军路线估计失误，设伏的军队和敌人提前遭遇，这让这两个师的战士不得不和敌人展开激烈的遭遇战。

**寻淮州的牺牲与先遣队的失利**

王明和博古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

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在延安整风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绝检讨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在1941年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王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支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抗日）关于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的电报，批评中央。

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还针对毛泽东批评的四个方面，逐条进行了反驳。当王明听毛泽东说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要他说明自己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时，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

但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对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进行反驳。当会议决定要他写一个检讨错误的声明书时，他以种种理由拒不书写。1956年他到苏联治病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国。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他更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意旨，撰写《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等文章和书籍，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左”倾、右倾错误辩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博古

的态度就与王明完全不同。当他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评后，多次认真地作了检查。在1941年9月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博古作了两次发言，承认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他是主要负责人。

博古的检讨是诚恳的，而王明的检讨是不诚恳的。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对他们的批判也是不同的。

但由于王明、博古对错误的态度不同，在这之后，毛泽东等人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批判，就只着重批判王明，对博古很少提了。博古1946年4月8日遇难后，中共中央和权威的中共历史着作就不再将博古与王明并提，而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只说成是以王明为代表的。

在

中国新民主主义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革命时期，有一个人不可不提，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的王明。（为什么这么说，王明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犯的左倾错误）

1929年，留苏的王明回国后，先任《红旗》编辑，发表了一系列的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然后又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中共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致在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带来不了估量的损失，差点酿造成了灾害性的后果，若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扭转乾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将惨丧其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明再次返回国内，俨然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居，一度坐镇武汉，在那里向全党发号施令，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

他与中共中央既定之策大唱对台戏，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致又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得在抗战初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很大损失。